

史学精粹

谢贵安:《试述〈明太宗实录〉对建文帝形象的描写与塑造——兼论传统史学的曲笔与直书问题》(《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1期) 《明太宗实录》是以朱棣为传主的帝王专史,为了突出朱棣这个主角,该实录将他的对手建文帝塑造成反派配角,对其形象进行了有意的弱化、矮化和丑化,将建文帝描写和塑造成僭伪者和昏君的形象,经常受到朱棣感召的被动形象,以及听任“奸臣”摆布的庸君形象。对建文帝形象的塑造,反映了实录修纂具有主观性的一面。然而,该实录在记载建文事迹时,在不太敏感的内容上也保持了据实直书,也具有客观性的一面。

雷勇:《从〈隋唐演义〉看清初小说家的历史观》(《中国文化研究》2011年第1期) 《隋唐演义》是隋唐历史题材小说的集大成之作,由于题材来源的复杂性,作品中体现的历史观也比较复杂。作者继承了传统史学的道德理性精神,在总结隋、唐两代兴亡教训时肯定“人事”的作用,在对隋炀帝、唐玄宗失国原因的具体分析时也带有较浓的理性成份。但作者的历史观也有非理性的一面,对一些历史现象无法解释时将其简单地归之于“天命”和“天数”。用“天命”、“天数”来阐释历史是清初白话小说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这既与明清易代的现实有关,同时也是这个特殊时期文人文化心态的一种折射。

尚小明:《由“分期”史到“断代”史——民国时期大学“中国通史”讲授体系之演变》(《史学集刊》2011年第1期) 民国时期大学的“中国通史”讲授,有一个从模仿西洋史“上古、中古、近古、近世”的“分期”体系,向“断代”体系逐步演变的过程,最通行的断代方法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六段。在前一种讲授体系下,由于分期标准难以确定,造成时期划分极端混乱,中西历史对照讲授的目的难以达到,而且由于受西方中心史观的影响,还出现了强分时代乃至割裂历史的弊端。因此,这种讲授体系逐渐被各大学所抛弃,而代之以后者。后一种讲授体系的最终确立,是在分段问题上充分考虑中国自身历史发展特点的结果。其问题主要在于各段历史在实际讲授过程当中,常常不能衔接,造成“通史”事实上“不通”。与通史讲授体系的演变相呼应,通史教科书的编撰,也大体经历了一个从模仿西洋史分期,到依据本国历史发展特点构建本国通史著作体系的演变。这是中国史研究逐渐深入的一个表现。

赵永春、赵燕:《20世纪40年代以来欧美学者金史研究概述》(《东北史地》2011年第1期) 欧美学者的金史研究,主要是按照魏特夫等人所构筑的“征服王朝”理论,视“中国”为单一的汉民族国家,将北方少数民族说成是外族和外国,强调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对立,是不可取的。但他们对金朝女真等少数民族给予一定程度的重视,并提醒我们不要将北族王朝的汉化问题讲得过于绝对,具有十分重要的警醒意义。此外,他们对金代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文化以及文献资料的运用等一些具体问题的考证和研究,也多有可取之处,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石莹丽:《论梁启超“新史学”的方法论特征及其对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影响》(《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在许多研究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著述中,大都就“新史学”救亡与启蒙功能作了许多细致的挖掘,而对于“新史学”所倡导的跨学科的治史方法涉及不多。“新史学”在当时确实起到了济世救国的作用,现在重新回首“新史学”走过的百年历程发现,它在20世纪中国历史学中彰显出的魅力则在于倡导一种总体史的著史范式和多学科的治史方法,并为日后唯物史观派史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与唯物史观派史学一脉相承。

刘贵福:《梅光迪、胡适留美期间关于中国文化的讨论——以儒学、孔教和文学革命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1期) 认为留学初期,梅光迪以创造中国新文化为己任,发掘儒学的现代价值,对其不适于现代的部分则加以批判,积极探索复兴儒学和融合中西文化的途径。这一主张得到了胡适的积极呼应。在孔教运动中,梅光迪赞同建立孔教,而胡适则对简单恢复孔教的做法提出批评,二人还就基督教、西方现代文明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1915年后,胡适以实验主义为指针,力倡文学革命,梅光迪对其积极支持,同时也以新人文主义观念不断予以批评,尤其是在诗歌问题上。胡适、梅光迪关于文学革命的主张尽管不同,但却相反相成,相生相长。胡适倡导的文学革命主张在近代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上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而梅光迪对其的批评也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对近代中国的文化变革颇具启示意义。

吴怀祺:《近代报刊与史学近代化》(《安徽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有关历史学内容的报刊的出现,既是史学近代化的产物,又促进了史学近代化的发展。近代报刊为新史学产生、发生提供了平台,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近代报刊,就不可能产生近代新史学。近代报刊促进了史学理论更新,成为学术争鸣、争论与交锋的阵地。在这一过程中,近代史学学科产生,锻炼与培育了新型的史学人才,产生了有影响的史学大师;形成了不同学术旨趣的史学流派和史学思潮。近代报刊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21世纪,信息化对报刊的形态、发展提出新课题。应当从振兴民族大业、学术创新,从时代性、民族性的要求,思考报刊发展的问题。

庞卓恒:《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四次论说及历史哲学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认为马克思多次提出过社会形态依次更迭的论说,每次论说的时代背景、语境、历史指向和列举的社会形态名目和更迭顺序都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列举那些形态和更迭顺序都只是作为“大体上”讲的历史例证,用以说明人类社会形态有一个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普遍规律,绝不是要认定其中每个形态和更迭顺序都是各个民族“普遍必经”的阶段,绝不是要描绘那样一个“一般发展道路”的公式。他始终强调的是,各个民族的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是共同的,但具体的发展道路和模式是千差万别的。这是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核心内容。他在不同场合举出不同的历史例证,都是为了揭示和阐明这个核心内容。

张井梅:《拉·波普利尼埃尔史学思想散议》(《北方论丛》2011年第1期) 文艺复兴时期,法国经历了一次“史学革命”,拉·波普利尼埃尔以其前瞻性的和富有批判精神的史学理论,成为其中的佼佼者。他身体力行地进行着历史学实践:追溯历史本原、追寻历史真实、追求完美历史。研究波普利尼著作中展现出来的“高卢风格”、“客观历史”和“完美历史”等理念,有助于我们了解与认识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史学。

刘爽:《历史教科书变化与当代俄罗斯政治》(《国外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伴随着苏联解体和俄罗斯的转型与复兴,历史教科书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领域折射了俄罗斯社会改革的曲折历程。近年来,为实现“富民强国”任务,重塑大国形象,在俄罗斯官方的重视和支持下,历史学家更加重视客观评价祖国历史,批判“历史虚无主义”,为俄罗斯现代化战略提供理论支持。历史教科书的明显变化,直接反映了当代俄罗斯的社会要求和政治走向。

刘文明:《从全球视野与生态视角来考察历史——克罗斯比治史方法初探》(《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1期) 克罗斯比是美国知名的全球史学家和环境史学家,他的著作《哥伦布交流》、《生态帝国主义》和《病菌、种子和动物》等,从全球视野与生态视角来理解欧洲的兴起及其扩张,并试图构建起一种具有普遍解释力的历史研究的“脚本”。这一“脚本”的基本内涵包括:将人当作一个生物体来理解;关注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从全球生态系统来理解欧洲的扩张;借用地理学、生物学、生态学等其他学科的方法来研究历史。他的研究具有开创性,其治史思路与方法值得我们借鉴。

杨祥银:《当代美国“口述史学”的主流趋势》(《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2期) 作为20世纪中叶在美国兴起的一门重要的历史学分支学科,口述史学以其在挖掘史料和再现底层声音方面的独特优势而迅速引得美国史学界和相关领域的关注,成为推动美国史学革新与跨学科发展的重要力量。文章将当代美国口述史学放在美国史学史与国际口述史学的发展背景与脉络中,进而分析过去60多年来美国口述史学不同发展阶段的主流趋势。